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七七期 ——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04d)

---

【史料存真】在中共“九大”1969年4月14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周恩来
【历史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选)	
【史海钩沉】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立纪实	卜伟华
【研究报告】《中国知青史》(节选)	刘小萌
【当事者说】发端	曲折
【往事追忆】三十年前的一次“政治任务”	刘志军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料存真】

在中共“九大”1969年4月14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 周恩来 •

同志们：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贺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我们回顾四十八年来党的历史。我们应该经常回顾党的历史，回顾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斗争的历史，回顾党在四十八年所积累的胜利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回顾党在国际关系中的斗争经验，回顾我们为什么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二十年后的今天又面临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

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都表示决心，并且都坚决相信，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一定能够实现！

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论证和说明了毛主席这一伟大学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并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证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和发动亿万群众来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扼要地、系统地总结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战斗任务。他在报告中，恰当地给予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应有的评价。在分组讨论中，大家公认，林彪同志的这一报告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革命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他的倡导下，在一九六一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世界革命人民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革命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影响。

一九六五年底，在毛主席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的反革命阴谋，并且在他的倡议下，召开了形成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它的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阐发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林彪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工业会议，一九六七年三月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严厉批判了来自右的和“左”方面的逆流和翻案邪风，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林彪同志的这些讲话，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全国亿万革命人民，特别是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战斗号令。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份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

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刘少奇、彭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线。

在彭德怀的篡党、篡军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的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重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把我军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林彪同志提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整套方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世界革命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国内外形势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敌人的。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落实政策，奋勇前进，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原载《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

## 【历史文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选）

◇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份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

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份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

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份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 ◇ 历史的伟大转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

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份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

## 【史海钩沉】

### 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立纪实

• 卜伟华 •

#### ◇ 学校出现反对派学生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开始，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不断升温，一大批学者、专家和他们的著作受到批判。

在这种形势下，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开始把与部分教师和学校领导之间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1966年5月10日，骆小海写了一篇题为《从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



待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校领导的文章，指责学校不把毛主席的书作为最高指示。

同日，万邦儒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预651班许多学生认为校领导在报告中没有强调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在运动中要自觉革命，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认为不强调这些，那就是假革命。

随着形势的发展，反对学校领导的学生不但没有被压下去，反而逐步发展、扩大，同情或支持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十来个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这就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 ◇ 红卫兵运动拉开序幕

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北大大字报的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时学校把教学楼五楼一个曾作为阅览室的大教室腾出来，专门作为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6月2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醒目地出现在五楼大教室。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签名的有一百多人。这是红卫兵的第一次公开亮相。6月5日，在一张题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里，红卫兵已经毫不客气地把清华附中党支部称为“近在身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了。

#### ◇ 同工作组产生了分歧

6月1日以后，北京各大中学校都处于一种极度兴奋和忙乱的气氛之中。大中學生开始走出校门，各学校之间的串联越来越频繁。

6月8日上午，一些中等学校学生约三百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此后，红卫兵的名称很快就在北京许多学校里传开了，以红卫兵或红旗等命名的学生自发组织成批出现。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之初是全力支持红卫兵的，但不久即与红卫兵产生了分歧。6月21日，清华附中召开全校师生代表大会。在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红卫兵与工作组发生了分歧。工作组要求革委会有广泛的代表性，应该吸收一些红卫兵以外的左派参加。红卫兵认为那是“拉夫”，会使革委会背“包袱”。在红卫兵的坚持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红卫兵担任。

6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团结大多数的問題。红卫兵认为这篇社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是折中主义，决定公开进行反击。6月24日，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贴出大字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红卫兵的行动使工作组大为恼火，工作组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实际矛头是指向工作组的。”

当时正值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提出“反干扰”的要求后不久，许多反对工作组或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被当作“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坏人”，而受到批判，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非法”。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此时士气正旺，并没有在这样的形势下退缩，他们于7月4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7月27日，海淀区召开中学生代表大会，江青等人到会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消息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决定将与工作组的矛盾公开。当晚在校内贴出《向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猛烈开火》的大字报。

◇ 毛泽东表示热烈支持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请她将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主席。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王铭和卜大华，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传达给红卫兵。毛泽东在信中对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信中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当天就作为一份重要文件印发给刚刚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尽管没有正式发表，这封信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组织不但在北京各中学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各高校、机关也开始有了发展。

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首都和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

8月19日，各大报刊在发表大会消息的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8·18”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布全国城乡。

□ 原载《党史信息报》

~~~~~

【研究报告】

《中国知青史》（节选）

• 刘小萌 •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是针对当时高小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却成为

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国家也确实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到农村去，当时农业合作社的建立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材。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语日后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口号。却很少人注意到，它原本是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同年，共青团开始组织青年垦荒运动。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共计60人行抵北国边陲的黑龙江萝北县，建立起以北京市命名的村庄——北京庄。

1960年9月下乡女知青邢燕子事迹发表，引起青年热烈反响。

1962年在全国范围有组织开展知青上山下乡活动首次提出。其实，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都是回乡知识青年。由于进城就业道路基本被堵塞，同时也由于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提高，1962年共青团中央统计：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1965年回乡知青已接近4000万人。

实际上，只有当每年数百万之多的家居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视回乡务农为唯一归宿后，国家才能把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完全转到城市。1962年1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

60年代初，当血统论思潮抬头之际，国家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理由下，加强了对“黑五类”子弟在高考、就业方面的限制。每名毕业生尚未跨出校门，他们的档案上已根据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录取”，即使成绩优异，也只有落榜一途。当这些青年的升学、就业之途变得日益狭窄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上山下乡。

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启示，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有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才能与“反动”的或者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才能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60年代初树立的城市知识青年典型主要有天津市的王培珍、赵耘，北京的侯隽等。与回乡知青典型大相异趣的是，城市知青典型很少有在推广农业技术、作物改良、良种培育、文化普及等真正有助于农村社会发展诸方面扎扎实实做出成绩者。他们的扬名，更多地是因为国家需要树立这样一批榜样，以推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长期、持久、更大规模地开展。

1966年11月，福建省崇安县某农场知青邱学锋，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向中央要求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权利。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一些地方的场队干部不甘心引火烧身，转而拿软弱可欺的下乡知青开刀。下乡知青返城“造反”风潮涌起。不过，大多数知青迫不及待地要求造反，还与他们时时关注的“户口”有关。返城知青集中抨击“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显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而全国性知青组织羽翼渐丰，又预示着这股破坏性力量益发难以控制。而且，知识青年要户口，要工作，加重了城市经济的压力，也为逐年增加的待业人口提供了决策者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反面榜样。

由此，1967年1月18日“文汇报”发表社论，“人民日报”于5月4日和7月9日，连续发表了两篇重要社论，系统阐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突出强调了它在三大革

命、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方面的重大作用。从此，这项旨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而在60年代初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经济性措施，被完全曲解为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运动。

◇ 1967—1973年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勃然兴起，打断了上山下乡活动的正常进程。11月，河南省郑州市一批中学毕业生抵达西藏高原军垦农场安家落户，北京市900余名知识青年赴山西华北农垦兵团参加农业生产。这成为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活动的尾声。以后将近一年里，“文革”动乱迅速波及全国城乡，各级党政机构几近瘫痪，已无法着手知青下乡的动员和组织。

1967年秋，北京市的红卫兵主动申请到边疆插队落户，从而拉开了“文革”10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将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67—1973年；第二个时期，1974—1976年。这两个时期不仅各有自己的高潮，而且以1973年7—8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为界，在政策上显示出种种变化。

## 一、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泄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誉为“一月风暴”，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同时，“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极“左”路线羽翼下产生的权力形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

“一月风暴”咆哮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毛的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共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

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风行大、中、小学校。这对“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一些地方的大、中学生，依旧滞留校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以致武斗升级，流血事件层出不穷。

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对武斗升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问题很快突显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眉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动乱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状态。当许多地方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项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和单位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校继续将“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头角。

## 二、第一声号角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活动，最初并不是政府动员组织的结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届”中学生自发倡始的。

“文革”10年，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即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极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为与尔后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又称新红卫兵相区别，将这一时期的红卫兵称“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新红卫兵）。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校、跨地区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建立，标志着“老三届”学生领袖的“改朝换代”。然而，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是所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政治取向、思想观念大都如出一辙。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 （一）真诚的探索者

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发初，在全国每一所大、中学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通宵达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她们认为，旧的高考制度“突出业务，突出分数，贬低政治标准”，“排斥工农子女”，“扩大三大差别，和封建社会考状元没什么两样”。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它助长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于是，义愤填膺的女学生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信中写道：

高中毕业生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这是一条新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这条无产阶级自己的路。亲爱的党呵，敬爱的毛主席，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我们整装待发，就等着您一声令下。

6月7日，湖南长沙一中的一个共青团支部向全国高中毕业生发出倡议，彻底摧毁“升学考试”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并列举了它的21条罪状。6月10日，北京男四中毕业班的学生也写出一份题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倡议书。他们更加鲜明地提出，今后的大学生要“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者入学”。并且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青年学生的倡议得到了“文革”领导者的支持。6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考制度。

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只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环节，随之而来的，是更广泛、更深入的全面批判，所谓“反动的招生路线”，“封、资、修的教学内容”，“束缚学生思想的教学方法”，“冗长的旧学制”均在扫荡之列。

1966年下半年，当红卫兵运动正处在“破四旧”、“大串联”的如火如荼阶段时，已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在意识到原先考大学、当专家的道路被否定之后，更热衷于脚踏实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于“文革”前学校教育的大量灌输，这条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对他们并

不陌生，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从一踏入中学校门起就经常被组织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大约在1965年以后，许多中学在每个学期都要组织一次下乡劳动，时间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同时，积极开展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尤其是电影《军垦战歌》、《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青先进典型，给予“老三届”学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面进行探索。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夺权造反”热火朝天，中学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自由。应该看到，在当时卷入“大串联”的学生中，目的并不相同，有的是热衷于到各处参加运动，“煽风点火”；有的乘机免费旅游，寄情于青山绿水之间；还有一些学生，真诚地想利用这一机会，摸索与工农相结合的途径。

探索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人的兴趣是在乡下从事社会调查，有的则尝试创办像毛泽东青年时代那样的自修大学和农民运动讲习所。1967年元月5日由一群知识青年自发组织的湖南共产主义战校将校址设在渔县七里湖农场。战校的《宣言》声称：这是一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抗大和解放军为榜样，面向工农，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新型学校。

通过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许多“老三届”学生对1967年教育制度产生很大反感，希望尽快投身于农村、边疆，在探索革命化道路的过程中真正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发起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曾与长期在广东省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初调赴中央工作的陶铸联系到海南岛去。在此前后，几批北京红卫兵自发前往云南、河南、东北等地的农场和农村。还有些学生，把“文革”前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成了社会调查对象。如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曾数次到河北省宝坻县（今属天津市）去访问邢燕子和侯隽，并与那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期。有的学生在深入到河北易县等老革命根据地时，对当地的插队知青产生了兴趣，便进行了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还有些学生更直截了当一些，早在1966年，就有学生利用“大串联”机会前往新疆，要求留在当地参加军垦；有些学生串联途经某个山乡，便不想再回学校，要求留在那里与农民一起“战天斗地”，如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北京长辛店中学的蔡立坚，就是串联路过山西一个小山村时决心留下务农的。虽然不久就被学校召回，但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涌起之初，她到底还是返回到那里。首批到云南西双版纳安家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也曾有过到该处串联的经历。

## （二）“飞向草原的雄鹰”

在再度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充当了开路先锋的北京25中学生曲折等人，实际上就是上述那些热情、单纯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曾想创办红卫兵大学，进行有关教育革命的尝试，后来学习了毛泽东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后，认为：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为此，当时的《红卫兵报》把他们誉为“飞向草原的雄鹰”。

曲折等人所以最先跨出这一步，是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文革”爆发，曲折带头成立了全校第一个学生造反组织“东风”。不久，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各校，以期稳定日趋动乱的局势。在各个中学，数目不详的一批应届高中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分子”、“野心家”。曲折和他的同班同学李冬民（后来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也在其内。他们在校内被批斗达40余天。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即，全国形势陡然一变。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扫而光，“革命左派”的桂冠则从天而降。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无疑增加了曲折及其造反派

战友对毛泽东的虔诚、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这的确反映了他发自肺腑的呼声。1967年3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一批著名的造反派学生跻身于它的领导机关。李冬民担任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曲折作为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认识到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树立的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做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曲折等人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会提出自己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人再到那里去”。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毛泽东尚未发表那段关于必须由贫下中农给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再教育”的著名指示。所以，在对上山下乡的提法上，侧重的仍是发挥知识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而不仅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改造。

在北京市召开的座谈会上，有的负责人希望知青把毛泽东思想带到牧区去，把所在之处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改造落后的东西，并强调向牧民灌输集体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他们将这次行动比喻为一次新的长征，勉励知青像革命前辈那样，经受往长征的考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做可耻的逃兵。毛泽东在阐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时，曾将它形象地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高度评价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老三届”学生，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对长征的历史、尤其是红军战士跋山涉水辗转二万五千里历尽艰辛的光辉业绩，无不耳熟能详。将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9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10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北京日报》的短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而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从这时起到1969年“老三届”学生离京，这场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山下乡阶段；第二个阶段，1968年夏到当年12月21日，是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至1969年春，此时“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在前两个阶段离校的，大多是对上山下乡方向持积极或比较积极态度的学生，特别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几批。

### （三）“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北京市革委会的期望并未落空，确有不少中学毕业生在曲折等人行动影响下，主动申请上山下乡。同年11月11日，又有1200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奔赴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带头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何方方。

何是“文革”初期中学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从奋起造反，到带头上山下乡，她的经历在“老三届”学生中不失为一种典型。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时加入共青团。“文革”爆发前为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担任班里的共青团书记，她与同班同学陈永康，是学校领导培养的学生骨干。“文革”风暴袭来，校领导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陈等人顺理成章地受到株连，被斥为“党支部的红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承受到压力。

1967年6月初，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由于他的女儿刘平平也在师大一附中读书，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该校的政治动向。工作组进校时，他亲自指示：师大附中党支部已经烂掉，下去要重组班子，要在学校中划分左、中、右，阶级阵线搞清了，再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何方方所在班是学校原党支部进行“教育改革”的试点，工作组一进校，又把该班当作运动中的试点。全班13名干部子女中，一些人的家长（包括何方方的父亲）已成为“文革”“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活动的第一批受迫害者，另一部分主要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干部子女，则依然保持着出身的纯正。工作组把后者当作运动依靠的“左派学生”，而何方方等人则被划入“右派学生”之列。何方方与同班6名干部子女对工作组的种种做法非常不满，又从内部小道消息获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上层出了问题，加之《人民日报》6月6日社论明确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于是在6月20日联名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这份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扬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惟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瓜有多长，他的伪装有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

大字报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主要不在于它对工作组进行了一连串猛烈攻击，而在于它的矛头明目张胆地指向了工作组的“后台”。既然工作组是在刘少奇直接关照下派驻的，刘平平又是工作组中惟一一名学生成员，所谓工作组的“后台”究竟指谁也就不言自明了。

大字报立即被反映给刘少奇。刘指出：何等人“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

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随后，何方方等人不断受到大批师生的围攻和有组织的全校性批斗。直到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各校工作组撤出学校，何方方等人才重见天日。

平反以后，何方方担任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市革委会委员等职。但她不安于充当抛头露面的“学生领袖”，招摇过市，而是奔走于内蒙包头、山西太原等地，积极参与当地的造反派活动，1967年秋才回到北京。9月，她听说曲折等人筹备往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本校上山下乡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她认为：当红卫兵造反的使命光荣结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插队落户，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最为革命的道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她明确告诉大家，准备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在校内不进行公开动员，完全依据自愿原则，谁愿去谁报名。同时强调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在那儿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她说：“我们要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根、开花，永远同草原上的贫下中农同战斗，共呼吸。”

在何方方这样一批学生骨干的带头下，北京中学生掀起“文革”中第一次上山下乡的热潮。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各校报名人数达到3500多人。最后被批准到内蒙牧区和东北落户的有1200人。未获批准的学生中，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有的是因为本人身体有病，有的则因为家庭存在政治问题被淘汰，理由是边疆地区“不适合”。

据当时的《红卫兵报》报道：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大力支持，由市委计划组和有关省、区的安置办公室派人进行了组织。这表明，当一大批毕业生自愿申请到边疆地区安家落户之际，一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已镀上鲜明的官方色彩。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前往东北、内蒙等地插队、插场（国营农场）。这在中国，的确先声夺人。

何方方、曲折等人，都是文革初从中学生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正是在他们的发起带动下，上山下乡运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

【当事者说】

发端

• 曲 折 •

这是我们10个人谁也没有想到的。23年前，我们10个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行动，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

从60年代延至70年代，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从全国各个城市走向农村、边疆，人数达1700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的迁徙。

1967年的夏天，“文革”已整整一年了，国家混乱，学校停课，武斗内战侵扰着一代热血青年，中学生已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没一人能回答。尽管不少人坚信中国将走进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但谁也说不出来明天会是什么样。我当时是二十五中高三学生，亦是当时首都中学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会报”——《兵团战报》。由于江青4月3日和4月4日两次讲话的挑动，北京中学生分成两派大打派仗，我感到十分无聊。以后想起来，当时确有不断革命、不断探索前进方向的热诚，但潜意识中是不是也有摆脱困惑、寻找出路的渴望呢？总难以说清。

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7月，我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300多人报名参加。在筹办红卫兵大学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部门青年运动的论述，很快问题出来了：按“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我们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顺理成章的推断是：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选择什么样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呢？

我们当时无疑深受60年代初期党为青年学生树立的那些榜样人物的影响。那时候为了发展农业（或许还有精简城市人口的需要），新闻机构曾大力宣传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城市青年学生中的先进人物，邢燕子、侯隽、董家耕、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青年楷模，对不甘平庸的中学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在此其间，曾去狼牙山进行过社会调查的女八中学生郭兆英，多次和我谈起广大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谈起农民养活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大大影响了我的思想。后来她和我一同走向草原，成了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妻子。这样，自然而然地，在我面对“与工农相结合”方式的选择时，上山下乡就成了合乎情理的首选目标了。这个决心的明朗化是在炎热的8月。

报名参加筹办红卫兵大学的几百人，原以为我们提出的教育革命是类似学工学农、开门办学之类的事情，顶多不过一两年。当在我自己举起的“旗子”上写下“上山下乡”的大字后，这几百人只剩下10个人。

这10个人是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金昆、郑晓东、胡志坚、高峰、鞠颂东。大家坚定地表示，即使只剩下一两个人，这条路也要走下去。筹备的第一件事是选地点，理想主义加青春的浪漫，当然惟恐走得不远。哪儿离北京最远？在地图上沿着中国的边界线找。新疆拜城这个极为生疏的地名被我们选中了，计划9月底在当地大雪封山之前就出发。

我们到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这个计划。劳动局安置办公室的同志不太赞成我们去新疆，说是中苏边境上纠纷多，不稳定，建议我们到内蒙古去。我们同意了，并答应等待市里出面去与内蒙古联系。

10月初，锡林郭勒盟派安置办的杨振祥、张保德同志到北京接我们。

我们10人中没有一人的家长同意子女去锡盟草原插队落户，但多数人又不敢公开反对，那样政治压力太大。只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坚决反对，将这个同学关在屋子里，自己坐在门口守着。我到他家去说服，讲多少都没用。这位同学的妹妹很支持哥哥，送饭时夹进一张纸条，鼓励他要坚强，要“冲破阻力”。在妹妹的帮助下，他终于冲破坐在门口的那个“阻力”，躲在家人找不到的地方。最后这位同学没从家里带任何东西，两手空空与我们一起踏上征程。

10月8日那天，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丁国珏、李冬民（我的同班同学、北京市红代会负责人之一）、北京市劳动局的领导与我们话别，叮嘱我们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到牧区后要虚心向牧民学习，尊重民族风俗，把牧区建设好，还要求我们为在校未分配的中学生带个好头，打响第一炮。我第一次隐约感到，他们可能把我们去内蒙草原同中学生的毕业分配连到一块去了。

10月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我为自己改名为“曲折”的时候，我确实是打算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曲折的路，曲折的道路，就是从10月9日这一天开始的；曲折的道路，始于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前。

那一天的清晨，我们10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已聚集了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和亲朋，北京市劳动局组织了欢送队伍，气氛很热闹。我们在金水桥前列队，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由我领读誓词：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一一无限忠于您的红卫兵向您宣誓：

您伟大的思想，是指导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最最光辉的灯塔，我们永远永远无限忠实于您，无限忠实于您的思想，忠实于您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活学活用您的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前面有曲折，也有反复，但是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耀着我们，我们永远高举您的思想的伟大红旗，前进！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在这样充满时代色彩的誓言的激励下，我们带着光荣的、也是沉甸甸的使命感，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地北上了。

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我们去内蒙古插队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也纷纷报导。（后来有些记者跟到了蒙古包，跟到了羊群边，争相采访）我们的行动，在当时对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0月14日的傍晚，我们终于到家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这长达20个字的地名常常使我感到自豪，它的蒙古族情调总提醒着我一种全新生活的开始。热情的牧民从几十里外骑马来看望我们，送来了奶豆腐、炒米、炸口子。为我们烧奶茶，煮手扒肉。蒙古包里挤满了人，欢迎会别开生面：牧民不懂汉语，我们不懂蒙语，我们用刚刚在盟里学的几句蒙语表了决心。

夜幕降临，我走出蒙古包来到草地上，牧草虽黄却仍散发着芳香，繁星眨着眼好像离我那么近。蒙古族姑娘Q日布站在身边，我兴致正浓，邀她为我们唱支歌，她欣然答应，唱起了《望北方》，歌声悠扬、嘹亮，在幽静的夜空中回荡，撞击着我的心扉。我完全陶醉了。那一刻，我爱上了白音宝力格我的新家，爱上了新家的牧人们。

当我们10个人走出了自己人生中这转折性的一步时，我们对以后的事并没有多想。我们没有想到此举如同一颗火苗，燃起了熊熊大火，燃遍了“文革”中的中国大地。

我们在草原落户后的第二个月，即1967年的11月，第二批北京中学生300多人也到了锡盟牧区，分别在东乌珠穆沁旗和西乌珠穆沁旗的几个公社、牧场当上了“新牧民”。

1968年的夏天，我被叫回北京，协助市劳动局安置北京中学生。那时“文革”已整整两年了，史无前例的内乱使中学生失去了升学就业的机会，该离开的出不去，该进校的进不来，社会问题十分严重。北京市政府非常焦急，开始动员六六届、六七届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

或到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幕场景使我总不能忘——北京市革委会召集有安置北京学生任务的几省劳动部门的同志开会，其间，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站起身来，双手抱拳，作揖请求：“各省来的同志们，都请帮帮忙，各自再增加些人，刚才东北的同志已表了态，他们再多接收400名。看看哪个省还能再多安排些？求求在座各位了……”这场景、这番话，不知会让当时正豪情满怀的红卫兵小将们做何感想，我却一下子感到了一阵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处理品”而被拍卖的深深的悲哀。

1968年夏末秋初，40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锡盟牧区。在此前后，北京中生成批奔赴东北、内蒙、山西、陕西、云南……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于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后在全国形成了高潮。

当我们非常真诚地踏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时，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为上千万中学生的安置工作提供了思路，更没想到在我们的身后，是10年间17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而后又离开农村回城，造成举世罕见的人口大迁移，冲撞得中国社会数年间动荡不安。

时间已到了90年代，人们仍忘不了“上山下乡”这场运动。人们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角度去描述它。1700万知青“过来人”或许会有1700万种评价和描述。我能说什么呢？我在此只想把那个真实的“开始”告诉世人，留给后人。

□ 摘自姜昆、石肖岩、李晓华等编：《中国知青回忆录一九六九——一九七九》  
~~~~~

#### 【往事追忆】

#### 三十年前的一次“政治任务”

• 刘志军 •

1968年，17岁的我从北京去山西襄垣县插队，1972年春被推荐到北京清华大学学习。5月的一天，我突然被学校党政办公室叫去，一位代表党委的同志向我郑重地传达了一份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大意是：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想拍一部以北京一家人为背景，勾勒出具有几百年历史的纪录片《故宫》，以此反映中国解放后发生的巨变，希望此片能为促进中美建交和中国加入联合国起到一定宣传作用……他又告诉我，北京市外办经过严格审查，从众多家庭中确定由根红苗正、子孙满堂的我家接受这项“政治任务”。

我认真看了一遍这份标有“国务院办公厅”的红头文件，其中在“注意挑选家庭出身好”的条件下，还有周恩来总理亲自用铅笔加的批示：“在校表现尚好的人。”校领导交待说：“国家很重视这件事，过去外国人只是用文字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而这回是西方人第一次以图像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中央办公厅将文件转到市政府，市政府又转到市外办。露西希望通过北京一家人的生活，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你们家就代表了中国，你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完成。课还要上，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去。”接着又叮嘱了一些外事纪律。

我回到家后，才知道，父母所在单位以及两个妹妹、两个弟弟所在的工厂、学校，都由他们的领导分别通知并做了工作。当时尽管我和家人并不知道自己上银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党组织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一定要努力完成。为谨慎起见，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受周总理委托，亲自到我家实地查访，看了我的爷爷、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家里的生活情况，又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了深入了解，以决定能否让美国人直接来我家。

开拍的第一天，我们一家人在外国人面前都显得非常紧张，有时一个镜头要反复拍几次。然而当我们刚进入角色，露西又有了点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站在一起就像部队一样。后来我大妹刘美蓉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每次拍完片，都小心翼翼地把衣服叠好，生怕弄脏弄坏，二妹刘惠敏则去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

拍片中还有一件令露西头疼的事，就是群众围观。那时政府年年“五一”、“十一”下文件，要求群众见到外国人不许围观，要不卑不亢，有礼貌等等。文件虽然传达到各家，但群众一见到染着红头发、涂着紫嘴唇、衣服艳丽的露西，金发碧眼的加拿大籍照相师奥瑞女士，露着胸毛、一脸大胡子的世界著名新闻摄影家汤姆，便不由自主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像在动物园里看动物一样，紧追不放。开始中方工作人员还解释：“这样不尊重外宾，影响他们的工作。”见围观人根本不听，后来就只好轰，但轰这边，人又跑到那边。露西不得不尽量将拍摄时间改在故宫静园后或每天开门之前。

拍电影挺累的，尤其是在大太阳底下，浑身晒得直冒油，又累又渴又饿。有时外国人拿出汽水、面包请我们吃，可一想到要不卑不亢，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我们就婉言谢绝了。可老外挺认真，还以为你真的不饿、不渴呢。唉，其实那是蒙自己呢。《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人群中。

近三个月的拍摄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露西一行，对他们为积极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而我家参与拍《故宫》这件事，媒体既没报道，我们也没和别人说，连自己在电影里究竟啥样也不知道。直到一年后1973年，我才在一位清华政治老师的陪同下，一块去中苏友好协会看到了这部长达57分钟的英文纪录片《故宫》。

《故宫》在美国放映后，立即引起轰动，许多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当年这部影片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 摘自《纵横》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